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九期 ——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5b）

【史海钩沉】“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班	莽东鸿
【痛定思痛】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陈虹
【不堪回首】焚心煮骨的日子	王西彦
【往事如烟】俞平伯等人在“五七”干校	何西来
【历史资料】我们曾经这样纪念“五二三”	渔歌子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班

• 莽东鸿 •

1966年6—7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 “群英荟萃”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文化部各级部长、局长，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电影导演，以及艺术院校、电影院校的院长、校长、教授，出版社社长、编辑，可谓“群英荟萃”，有人称之“文代会规模”；其中有林默涵、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冯雪峰、田汉、阳翰笙、曹禺、刘白羽、马思聪、叶浅予、萧乾、唐瑜、冯亦代、黄苗子等等。

不少人是从“四清前线”奉召撤回，刚刚返抵北京，就被送到集训班。在山西长治农村搞四清的北影陈强、海默、田方、崔嵬、汪洋、赵子岳、谢芳等人，以及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一批人，都是在回到北京当天，就去了集训班。中央美院叶浅予等人则是刚刚被批斗，被要求次日“在校内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突然被学校送来的。

“学员们”进集训班的时间不尽相同，有6月上旬或中旬的，也有7月的。

集训班主任是不久前从部队调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颜中仁。各组组长、副组长都是穿军服的军队干部，组长是团级干部。

集训班领导宣布：到这儿来参加集训的人，左中右派都有。后来知道，左派们在集训班内是从事了解情况的。中央音乐学院的17人，除了马思聪一批教授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h之外，还有一些行政干部，内中许多人是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事科长也参加了集训。

在开班典礼上，颜中仁说：“你们想回去，可以呀，只要你‘竹筒倒豆子’，下午就可以回去！”还说：“周扬同志本来也是要来的，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得了……”周扬没去，他在天津养病；但房间一直给他留着。

◇ 初期生活相当悠闲

开始时，大家在这儿过着一种表面上相当悠闲的日子，颇似开“神仙会”。

生活待遇很好，吃住好，气氛也好。这使许多来时胆战心惊的人吃惊。

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白天学习、读书、谈心。中午有午睡，晚上没事。周六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正面的，一部是“反面”的（被批判的“毒草电影”）。闲暇时，有人散步、跑步，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唐瑜回忆，当时“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他还笑着悄悄对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

住宿条件也好。两人一室，窗明几净，席梦思床，有服务员拖地板、送开水。一切都很舒服。只是每个房间住的人，全都打乱分住，互不相识，不让同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

伙食出奇地好，唐瑜的评价是“相当精彩”。每天每人的伙食费虽不过一元，却每天鸡鸭鱼肉不断，应时菜蔬俱全，餐餐都是满桌子的菜，烹调也好。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舒芜回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伙食，就这样，上面还说：‘有的老同志，还可以吃得更好些。’还在忙着为田汉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组织更高级的伙食。”才过两个来星期，陈强在南天河四清时瘦陷下去的两腿，重又丰满了起来。

晚饭后，大家到后园散步、聊天。不时可以听到黄苗子、冯亦代的高声谈笑。赵丹、孙维世他们每天谈谈笑笑，经常在小卖部喝汽水、吃西瓜冰淇淋。

集训班与世隔绝，平常不让出去，但电话可以打。星期天休息，各单位有车接送。

对于这么多名人，特别是大明星，管理、服务人员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态度客客气气。

被贬到四川重庆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匆忙赶来，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了双

凉鞋。他问唐瑜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集训班政委拉唐瑜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唐瑜这时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

舒芜很注意观察人们的表现。他看到，不同身份的人，表现各不相同，齐燕铭“可能知道一些上层内情，所以表现得心事重重，整天也不大讲话，显得忧心忡忡，早晨总是一个人找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独自打太极拳”。

◇ 揭发批判与斗争

好景不长。随着外界“文革”形势的发展，集训班里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这批文化界名人很快就结束了“文革”开展以来，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还算愉快的集体生活。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很快就贴上了墙壁，过道上琳琅满目。食堂厨师贴出了大字报：“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各单位的周日接送，也变得不那么客气了。后来厨师们做好做歹地继续烧饭，食客们则要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一起吃大锅饭。

一天，人们听说了一条惊人新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人们议论纷纷。

文化部派人来讲关于周扬的“罪行”，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马思聪回忆：“此外，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反动分子暗藏武器，包围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当时，尽管我们星期日还可以回家，但是对院外的事情和消息是非常闭塞的。”

开始是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周扬，没有涉及到自己。

在揭发周扬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大家争当左派。每天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都是冲着别人的。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洁白无瑕；还有人揭发林默涵是抱周扬大腿升官的。

随着《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阮铭、阮若璜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和《人民日报》7月份连篇累牍发表揭发批判周扬的大块文章以及《大字报选》，夏衍、田汉、阳翰笙及邵荃麟、袁水拍、胡风、冯雪峰、瞿白音、周作人、丁玲、陈企霞等人也被公开点名，揭发对象越来越多。

昨日亲密谈笑之声已经远去。人们提高了警惕，害怕别人牵连自己，或者害怕自己牵连别人。本来互相认识的，这时变得陌生了，见面连头都不点了。夏衍在楼梯口遇见唐瑜，四顾无人，便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人们之间开始揭发、检举，上纲上线。一些人发言的嗓门也大起来了，你大声喊叫，我比你声音更高，最后互相拍桌子，过激的言辞也出来了。大字报把林默涵的名字画成一只带毛的狗。邵荃麟病重，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被说成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在食堂吃饭，吐了一根实在咬不动的肉骨头，被当场斥骂并被喝令把吐的东西重新咽下去。孙维世被扣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

韦君宜回忆：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

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派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陶钝回忆：我看到大字报天天在增多，我发现过去我没有见过的事在今天有了创造：把被批判的人名上用红墨水打上×，使人名特别明显。如同在旧社会被判处死刑、砍头或枪毙的时候，把背上插标的死囚名子上用红墨勾掉，叫作“用朱”那样，一勾这人就身首异处了。这样打上×，表示这人就是不死也完了。究竟这项发明是谁的创造？是在首都的发明家呢？还是外地的发明传到北京来的呢？有待考证家去考证。

叶浅予回忆：每个单位都有革命积极分子掺合在牛鬼蛇神之中，因而“狗咬狗”的把戏表演得相当认真。除了张贴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言行，还开过几次斗争会，把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揪出来批判。

舞蹈学校的女校长被揪回单位斗争，头发被抓乱，身上泼了墨水。集训班管理人员说：“在这里只是要你们揭发批判，回去可不是洗温水澡，是热水澡等着你们。”舒芜所在的小组组长说，你们回到本单位的群众斗争中去，“会脱掉一层皮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臭皮，脱了也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普遍开始焦虑。唐瑜回忆，马思聪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

8月初，集训班结束。在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唐瑜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他认出那台摄影机是他在1951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

人们的离别，凄凄惨惨。黄苗子临走时给唐瑜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

◇ 迈出班门进炼狱

各单位陆续来车接人，“如驱猪狗，塞进卡车。”（韦君宜语）

人们回到单位，大都在当天就陷身于“阶级斗争”的烈火之中。

8月3日上午，音院马思聪等人被押上卡车。卡车刚开进学院，就被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包围。马思聪等人立即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每人还被迫拿着一只搪瓷破面盆作为“丧钟”，一面走一面敲打。赵h被强迫穿上肥大的羊皮袄。随后，他们被赶着在校园里，在38℃的炎热气温中游街。

8月9日下午，美院运载叶浅予等人的卡车一到学院，“牛鬼蛇神”们立即被押进操场，开批斗会。他们一个个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登上临时搭成的高台。红卫兵每人揪一个。喊完口号，在大礼堂召开批斗“走资派”陈沛的大会。

大概是8月1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行将近20人被汽车运回单位。被斗争一番后，开始“游楼”，韦君宜、许觉民等“走资派”排在前面，每人头上都被扣上一顶又高又尖的纸帽子，萧乾、舒芜这些“牛鬼蛇神”跟在后面。各层楼都挤满了革命群众，一个个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情绪激昂。

北影接人的汽车上刷着大标语：“横扫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一到，上面就跳下一帮人，把陈强揪上了车，给他套上一件写着“南霸天”的黑背心。在车上他们被造反派勒令跪下，不服的陈强、田方、崔嵬、赵子岳、汪洋、海默一个个都被踢倒在车里……卡车开进北影，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从车上拉下的人都被挂牌，反剪手，由两个造反派扭着，站成一字横排低头示众。曹积三记述，当前的情境，使陈强想起他在戏中扮演的黄世仁和南霸天挨斗的景象，迷惑不解：“怎么自己真的成了专政的对象，乾坤真的倒转了？”

□ 原载《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

## 【痛定思痛】

###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 陈 虹 •

近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1）又曰：“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2）

的确，目前所能看到的“干校文学”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洗礼》、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等；而且其中除了中篇小说《洗礼》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些回忆文章或者日记。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中，有人即将“文革”期间作家们的心态归纳为这样三种：1.矢志不渝的虔诚；2.难以排遣的哀怨；3.宁折不弯的抗争（3）。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则认为“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从心态上分，有“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三种（4）。然而，此类说法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作家们抑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心态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出现于1968年的那个“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其心态史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分析，是无法正确回答出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

本文将以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为一“个案”。它的特殊不仅在于集中了6000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更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的命与文化人的命，那么这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地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 一、进入干校之前

“五七干校”的正式提出是在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标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应该说此时每一位天真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亲口尝到这个“梨子”的滋味之前，无一不是抱着欢悦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

##### （一）战天斗地型。

卢永福是一个典型。这年他才四十出头，出身好，又没有什么“黑线”问题，是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出发的前一天他写了一首诗：“千百人的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眼眶。”来到干校之后，面对着荒湖野滩他又抒起情来：“‘五七’路，‘向阳’路，像红色彩带 / 把山冈和村湾衔接在一起。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向阳湖，和天空的骄阳竞放光辉。五七战士来到这美好的所在，五七战士对这里无限向往。这哪里是想像中的荒野，这分明是真善美的故乡。”〔5〕

于是他准备战天斗地了，要将已经插遍“上层建筑”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插遍在这“经济基础”之中。尽管三十多年之后卢永福对此进行了反思：“这或许也是一种‘愚昧’，一切都和革命联系了起来。”但是在当时它确实代表了一批年青的造反派的思想。

## （二）脱胎换骨型。

陈白尘是一个例子。他在《牛棚日记》里曾记载了1969年的秋冬为自己这个“黑线人物”能否被批准去干校而焦躁不安的心理——刚开始时被批准了，于是“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但不久又被除了名，于是“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极为苦恼”。等到第三次终于又被通过了，于是“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持有陈白尘这一心态的，亦大有人在。比如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我决心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今后就是要长期和泥水打交道，要过泥水关，要培养对泥水的感情。”

“劳动”一词在当年的干校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改造”的代名词。但是为什么这些堪称是“时代的预言者”的老作家们却要用如此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便不能割断他们本人的历史：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批虔诚的“殉道者”，以往的革命经历使他们最怕被排斥于自己的队伍之外，宁愿“脱胎换骨”，也要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正应了摩罗所批判的：“不敢对生命和世道这样严肃的问题进行审视，甚至对与具体人物连接的具体权势也不敢稍有怀疑。”

## （三）政治避难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萧乾。1995年萧乾在应“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邀请而为之题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这“避难”二字看似荒唐，但却真正表达出了他们这类人——少的是革命的资本，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污点”——的特殊心态。在这类人的心中满是恐惧与惶惑，以及“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的绝望。在干校期间，萧乾家的一只小猫突然失踪了，等到找回来两条后腿全都被人打断。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它活活受罪，不如给它一个‘安乐死’。”于是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6〕

这就是萧乾当年的心态——他宁愿让猫“安乐”地去死，也不愿看着它继续活在世上受罪。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明明是流放地却偏偏要称之为“避难所”，这便是这一类屡经政治风暴袭击的人的真实心理。

——就这样，在进入干校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反对过它、批判过它；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或以此为荣，或以此为罪，又或以此为避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历史在整个“文

革”期间应该算是最大的悲剧，甚至比初起之时的打砸抢更有悲剧性——那时毕竟还有着一部分人敢于以死相抗争，而如今则倒退到了异口同声的拥护与向往！

## 二、进入干校之后

“五七干校”最初的这段历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耻辱的。摩罗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说：“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这段话从总体来说是对的，但它却缺少了历史发展的眼光。

干校的岁月的确不堪回首，阎纲曾经这样总结道：“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是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全国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文化部‘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7〕这一灾难沉重地压迫着这批文化人，使得不少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也正是这一灾难“成全”了这批文化人，使得他们原有的天真“美梦”终于破灭！——中国作家群体心理的变化从这一刻开始了，尽管它还比较微弱，而且是千姿百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终于苏醒了！

### （一）当年的“矢志不渝的虔诚”开始动摇。

《向阳日记》的作者张光年即开始流露出他的“不满”与“反抗”了。那是一次全排的大会，有人揭发他在麦地除草时有意漏掉半行，而且“拒不承认”，“态度嚣张”。他忍无可忍起身反驳，结果被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干校中张光年的“脱胎换骨”的自觉性到了令人刮目的地步——爱人来信，他主动上交给政工组审查；集体背粮，他非要比人多背上二十斤……然而他的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的表现亦遭到了践踏。他开始悲怨了，愤怒了，“彻夜失眠”，“肝疼加剧”，以致最终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一头钻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之中。他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写道：“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

由深信到怀疑，这就是张光年的变化，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 （二）当年的“难以排遣的哀怨”转为坚忍。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干校中的知识分子们虽说也出现过献媚邀宠者、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人开始由惊恐和哀怨变得坚忍起来。对于这一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似乎都没有觉察到，后者尤其强调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8〕

其实，干校中的悲剧已经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悲剧意识”。显性的比较容易看见，比如说“胡风分子”牛汉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半棵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 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 / 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 侧着身子挺立着 /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 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 春天来到的时候 /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 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 半棵树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 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这不是“悲剧意识”又是什么？读着它已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他还有一首叫做《悼念一棵枫树》。牛汉说，那天当他听到这棵曾经供他小憩、供他倚靠的有如亲密的伴侣似的大树轰然倒地时，他飞一般地奔了过去——“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9）这难道不是“悲剧意识”么？——“一个生命又倒下了！”

牛汉的坚忍是显性的——他毕竟用自己的笔将它写了出来。然而在干校之中，还有更多人的变化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形式——我称它为隐性的。这个“隐”是因为它来自于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而表现出来的也同样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作为文化，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它软弱的一面——一夜之间可以被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但它同时却又具有着极为强大的另一面——就像岩石下的小草，时刻在挣扎，在生长。

早已是命如草芥的冯雪峰，铺盖中细心裹扎的仍然是书——陪伴了他一生的书；被折磨成“鬼”般模样的孟超，一旦躲避开“人”的世界，便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他的《宋词选》的海洋中……如果说这二位尚属“烈士暮年”的话，还有更多的原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树叶掉下都怕砸破头的典型的文化人，这时也都开始从久违的文化的蕴蓄中寻找到了支撑了。

沈从文被“流放”到咸宁干校时已年近七旬，周围没有一个亲人，血压高到240 / 130 mmHg。至于居住的条件，“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然而他却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么一种离奇不可设想的狼狈情况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记录，也是破近二十年总记录的”（10）。

陈羽纶下乡的时候是“老弱病残”四个字占全了，尤其是左腿被截了肢。然而这位善良到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翻译家居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默默地亦同样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生命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他怕人发现，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还将书包上了一个假的封皮。1995年筹建中的“向阳湖文化村”请他题字，书生气不减的他写下的竟然是：“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 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11）这句话曾经被用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但它同样也适合于“五七干校”中的作家——无论是帐内读书，还是灯下写作，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化的力量！韦君宜写有《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周明写有《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程代熙写有《我所珍视的“手抄本”》，宓乃宏写有《老前辈冯雪峰二三事》……他们所记载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群以文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而



作为他们的同辈与后辈又无一不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与内涵。

（三）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

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文革”之中的知识分子——“全军的覆没”、“启蒙的破产”，又或是“集体的麻木”、“价值的沦丧”，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在这一群体之中亦曾赫然地挺立着刚烈不屈大义凛然的田汉、吴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固然这些人都不曾去过干校，他们在结束自己生命时这一“新生事物”还没有出现。但是干校的历史并没有将这一“宁折不弯”的精神中断，它在继续发扬，而且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出现。

郭小川应该算是第一个。这位“战士和诗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在他的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12）他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在给郭小川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13）

李季、侯金镜等人也应该算作是与郭小川同一类型的人。李季曾这样回答妻子的不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清醒的、理智的。侯金镜的思索则更前进了一步，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这一类人的反抗都是公开的，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历史清白”。用郭小川的话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但是在干校中间还有大批的人却没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与资本，或是困于历史上的“污点”，或是囿于运动中的“前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亦勇敢了起来，他们或是冷眼相向，或是冷嘲热讽，总之均拿起了符合自己性格的“武器”开始抗争了——

因《李慧娘》一戏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孟超编出了自己的“歌谣”：“早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别人听，唱完后拍手大笑。诗人丁力因抗战期间参加过国民党，亦成了“老运动员”。他坐在田头写诗了：“老牛老牛听我唤，如今我无公民权。我只扬鞭不打你，你得替我快耕田。”不管是苦涩的幽默，还是含泪的嘲讽，这批“地下创作”无疑都是针对着专制与黑暗的。朱家骅本是文物专家，竟也不甘寂寞地写起童话来。他描写了一头小黑驴，原本无忧无虑地整天玩耍，有一天它的妈妈在干活时被石头砸断了腿，小黑驴从此结束了幸福的童年，开始去重复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有一篇是写一条小狗的：主人要搬家了，无法带它一同迁徙。小狗就像明白了一切，它烦躁地来回跑动，怨主人不讲友情，而主人却无法告诉它自己的命运也同样是茫不可知。

相比之下，陈白尘的胆子要算最大的了——他的“非法创作”竟是几大本实话实说的《牛棚日记》。他说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伟大”的时代。他的“校友”陈原读后写道：“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14）这些“地下”的创作虽说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是真实的存在。它们虽说都各自带着时代的烙印——或迷惘，或苦闷，但它们不屈服，不谄媚。它们是“地火”，是“于无声处”，是那时的中国的作家们值得骄傲的心理记录！

### 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对于干校的反思，确实实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整个“文革”进行反思的序幕与前奏。它既然已经开始，而且有人甚至在悄悄地动笔了，但是为什么“文革”结束后“干校文学”却始终没能掀起一股热潮？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去了。——看来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它涉及对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思考。大致来说，“文革”结束后作家们的心态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 （一）沉痛的反省。

持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当年的虔诚的“殉道者”。虽说他们在干校期间已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思索，但是要想彻底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一贯的思想，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张光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整理出版自己的干校日记时于引言中谈了他的想法：“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他反思自己：多年来“学而少思”，“惯于认真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一句话，“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譬如说，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天大祸，这是长时间难以理解的。又譬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

以张光年为代表的这一类作家，更多地是沉浸到了自我的反省之中。更何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张光年的身份已由“诗人”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对他来说，理性的思索已远远超过感性的思维与创作了。

#### （二）深刻的忏悔。

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理论家朱学勤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15）

忏悔是需要勇气的，真正敢于站出来忏悔自己的作家又有多少呢？——巴金承认自己曾虔诚地举起拳头，高呼着打倒自己；季羡林亦承认他每天在家偷偷练习坐“喷气式”，以求在批斗会上能够坚持到底……然而还有更多的真正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的人们呢！《牛棚日记》与《向阳日记》的作者在出版之时删去了原有的大量内容，前者在后记中写道：“为了不给更多的人添麻烦。”后者在引言中说：“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害人者也多是由被害者们所共同造就的。因此需要忏悔的，应该是包括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知识分子。

崔道怡是勇敢者之一，他撰文解剖了自己的“两重人格”。其“阳”的一面是写了许多吹捧诗：“五七的红旗展，五七的道路宽，五七指示金光闪，五七战士斗志坚。”其“阴”的一面则是背地里对全国形势充满怀疑，以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他忏悔自己：“‘文革’以来我便是以‘两重’人格在夹缝中求解脱的，现在还不得不以‘两重’人格在磨炼中求超生。”（16）鲁原初到干校时年龄也不大，但是在他的心头

同样有“一笔人情债”在重重地压迫着他。那是一位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妻子，她找到他，希望能给隔离中的丈夫捎个口信：“一定要相信自己。”然而鲁原没能完成任务，他畏惧于专案组监视的目光。如今鲁原老了，他终于在文章中写下了自己迟到的忏悔：“我的犹豫、缺乏行动性的弱点曾有过多次的暴露，而惟独这次最不可弥补、最无法原谅。”〔17〕

勇敢地进行“忏悔”的还有韦君宜，她终于在自己病倒之前奉献出了《思痛录》。尽管她所“思”的并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也不完全是干校，但是她终于以自己的诚实于人世间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知耻者近乎勇”，只可惜勇者太少了，抑或说尚在“姗姗来迟”吧。

### （三）历史的沉思。

在对于为什么不去创作“干校文学”这一问题上，还有着另一种回答——金冲及说：“我不想写‘伤痕文学’，因为没有那种心情。”聂绀弩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其实他们二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干校文学”决非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它是一次对于历史的严肃拷问，必须得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其实针对着如何反映这段历史，早在1978年臧克家出版他的诗集《忆向阳》时就引起过争论了。应该说《忆向阳》是“文革”结束后问世的第一部“干校文学”作品，只是因为诗人歌颂了干校带给他的“收获”，一时间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那么对于干校的这段历史又该如何全方位地来评价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苏东海亦在咸宁干校中待过。他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高级顺民”的观点：为什么在“文革”的初起时与结束时，拥护也好，否定也好，干部的表态均要落后于青年？阎纲则引用了一段陈企霞的话：“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总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18〕灾难的内涵固然是财富，但灾难的本身永远是灾难！

“五七干校”终于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究竟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呢，还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沉思说”成为了“文革”之后作家们的主要心态，也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就连在“干校文学”作家中名列榜首的陈白尘，也在他的《云梦断忆》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反映十年动乱的深刻而伟大的作品出现！……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未来出现的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于愿足矣！”

“伟人的作品”至今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并不等于它今后永远不会出现。有了反思，有了忏悔，更尤其是有了对历史的深刻拷问，这一批从炼狱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们将一定会把这一文化的蕴蓄与沉思传递下去，并严肃地交给他们的后人。

注释：

〔1〕〔7〕〔18〕阎纲：《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载《咸宁日报》2000年11月4日。

〔2〕转引自李城外：《将来应建一门“‘向阳湖’学”——访〈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

载《咸宁日报》1999年2月6日。

〔3〕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摩罗：《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卢永福：《向阳大会师，千古一风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6〕文洁若：《“大力士”》，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8〕〔15〕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载《书林》1988年第10期。

〔9〕牛汉：《一首诗的故乡》，载《向阳湖文化报》2001年3月12日。

〔10〕沈从文：《双溪书简二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11〕余杰：《人之子》，收入《骄子的叹息》，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韦君宜：《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转引自李城外：《小川长流向阳湖——访郭小川夫人杜惠》，载《咸宁日报》1996年1月23日。

〔14〕陈原：《读〈牛棚日记〉》，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

〔16〕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难忘咸宁干校》，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17〕鲁原：《向阳湖旧事》，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

【不堪回首】

焚心煮骨的日子

• 王西彦 •

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潮的，不容

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摔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

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

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

头们坐在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子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的，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

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

【往事如烟】

俞平伯等人在“五七”干校

• 何西来 •

1969年11月15日，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

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文学所知名的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都下去了。俞平伯还带着他的夫人“大表姐”。俞平伯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上午发言。到所里来，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结束。下午回家。15日2时30分，携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写“离老君堂寓”这几个字时，肯定是很有感触的。老君堂是俞家祖寓。俞家最有学问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说，“到平儿，俞家五代书香。”就是从俞樾算起的。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几十间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文革”中，他从正院被赶出，住进矮小的书房。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马樱花绽开粉红的花朵。这种花又叫合欢花。这时，俞老从偏院的墙头，看到马樱花开，便写了《七绝》一首：

先人书室我移家，  
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  
隔墙犹见马樱花。

这首诗后来在牛棚难友中传阅时被发现，把他斗得够呛。说他记了“反革命变天帐”。

写一首诗就是“变天帐”。诗书对于知识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祸之累。下干校前，很多人觉得没指望了，把书都卖了。离开自己的书，是很痛苦的。那时卖书，小本八分500克，大本一毛五分500克，报纸三毛500克，外文精装书还不要，得撕了皮才行。也有不乏远见的聪明人买书，几块钱就能买一套《资治通鉴》。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个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们。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没有横批。我自己可以加一个：香臭不分。“老别”也有典故。“文革”中，造反派写我的大字报说，“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云云。所里有个蒙古族同志，叫仁钦·道尔基，他的汉语不太标准，说这句话时结结巴巴：“我们有，有个别、别、别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别别”或“何老别”。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



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我们驻地在离罗山县城 5 公里多地的地方，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又从罗山搬到息县东岳公社。在那里划了 1 万多亩地。学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

到了东岳，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

一方面清查“5·16”。学习、审查不断。那时钱钟书管收发。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钱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

那里地特别多，我们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可见，他的确是虔诚地下去改造自己的。

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就用麻绳捆住秫秸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

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他对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诗为证：

脱离劳动逾三世，  
回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边新绿绕，  
依稀风景顶还家。

另外，他还有一首《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计，  
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  
可留些子忆贫农。

“屠龙”为典故。指学的本事没用。说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讹谬一样过去了。

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他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我记得其中三句：

炙背夕阳面壁居，  
毛公指点分明甚，  
悔不当初细读书。

50年代批判了他。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这首诗他的遗诗集《俞平伯旧体诗集》未收。

俞平伯在东岳住在水塘边，那个水塘很脏，不是清水，水泛黄绿色，很深。洗衣、洗菜，臭哄哄的。池塘边，有几棵苦楝树，春天开一种淡蓝色的小花。淡蓝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边，十分夺目，当是宜人的春色了。俞平伯又来了诗兴，写了《楝花二首》：

一

天气清和四月中，  
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  
淡紫英繁小叶浓。

二

此树婆娑近浅塘，  
花开花落似丁香。  
绿荫庭院休回首，  
应许他乡胜故乡。

故乡还是他在北京的家。到后来，干校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就让俞平伯夫妇先回了北京。他们已是60多岁近70岁的老人了。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

这就是当年的俞平伯。

大部份“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干校生活很单调，只准读《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报纸文件。《红楼梦》都不让看。军宣队说《红楼梦》是黄色小说。钱钟书带了几本比砖头还厚的外文辞典，一有工夫就看。辞典是工具书，看辞典，不会犯哪一条禁令。

□ 原载光明日报出版社《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

~~~~~

【历史资料】

我们曾经这样纪念“五二三”

• 渔歌子 •

一年一度“五二三”，照例都要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曾经如何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恐怕许多人已经淡忘了。现

辑录有关大事记若干条如下，以备有兴趣者参考。

◇ 1966年——

7月1日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公开点名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编者按中，称毛泽东这个讲话“针对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并称周扬24年来（即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同日 纪录电影《新闻简报（特号）·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上映。

同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各语言节目奉令将原开始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改为《东方红》。

7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陶铸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信中提出：彻底改组中宣部部领导；今后最根本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等。毛泽东于10日作出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 1967年——

5月3日 文化部、中宣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及首都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地质学院东方红等联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

5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送毛泽东审批。主要内容有：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等有关文学艺术的文件、批示；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和文章；发表样板戏剧本；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5月23日召开纪念《讲话》群众大会；10日至31日全国各主要城市举行庆祝活动；将一批毒草影片拿出放映供批判之用。

5月9日 毛泽东于凌晨1时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同日 新华社播发将于次日报出的《红旗》第六期发表的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日 中国作协造反派召集“黑帮”开会，要求各自定出属于哪类干部。刘白羽、邵荃麟、张光年、张天翼、陈白尘等都被迫自定为“四类”（即打倒对象），谢冰心、臧克家自认是“反动权威”。

同日 《新北大》报72、73期合刊发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青春之歌〉——中文系部分革命师生批判〈青春之歌〉座谈纪要》。

同日 《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革命派文艺战士”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演出情况，除天津市京剧团造反兵团、天津东方红歌舞团东方红公社、天津戏校八一七革命造反委员会、天津音乐学院八一八红色造反团、天津农村文工团“11·3”造反队等演出的“样板戏”外，还有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造反队活报剧《反修凯歌》、六号门工人文工团歌舞《回忆》等。

5月10日 《红旗》第六期出版，发表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为此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同日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

5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部队作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同日 新华社报道：《西南的春雷》（反映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斗争）大型歌舞剧在贵阳公演。

5月12日 《新北大》、《文学战报》合刊发表由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写的《文艺战线上两条战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

同日 首都红代会《首都红卫兵》报红20号开始连载由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北京电影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红军战斗团、中国舞蹈学院红旗兵团等编写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

5月13日 以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为首的“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违背周恩来有关不同观点群众组织要联合演出的指示，决定晚上7时半单方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文艺演出。以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为首的“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包括北京军区“新燎原”和八一体工队、军乐团、测绘学院、后勤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总政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与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北工大东方红等冲击会场造反，双方大规模武斗。伤50多人。

5月14日 周恩来凌晨4时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五一三事件”两派代表（各20人），首先批评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赵继烈他们冲击演出是错误的，再三强调要联合演出，不要分裂，军队要做联合的好样子。对两派进行说服教育一个多小时。

5月16日 《首都红卫兵》报22、23期合刊发表金敬迈小说《欧阳海之歌》修改稿（增加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选载。

同日 上海红旗（原海燕）电影制片厂、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联合组成的“批判大毒草电影《聂耳》联络站”晚上组织《聂耳》批判放映。

5月20日 《红旗》第七期发表黄锡章《反动电影〈燎原〉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燎原》，编剧彭永辉、李洪辛，导演张骏祥、顾而已）。

同日 《五洲震荡》报（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部分文体工作者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宣传组主办）2期发表《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三军联合演出的指示和三军首长对演出的支持》、《五一三严重流血政治事件的真相》。

同日 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画兵》报创刊。

同日 由北京市工代会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红卫兵总部等七个群众组织合办的《工农兵画报》创刊。

同日 中国作协造反派上午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刘白羽、邵荃麟、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等9人被斗。

5月21日 周恩来接见首都三军文工团部分代表。萧华讲话时遭到攻击。

同日 新华社报道：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艺汇演昨天开始。演出剧目除去样板戏和歌颂毛

泽东的歌舞外，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歌舞《红卫兵战歌》、北京开关厂红旗革命造反兵团《敢把皇帝拉下马》等。

5月23日 北京、上海分别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北京的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出席，江青主持。陈伯达、戚本禹在北京，姚文元在上海讲话。陈伯达讲话中吹捧江青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在北京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上海京剧院于会泳、中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钟润良、交响乐《沙家浜》指挥陈汝棠等，都无一例外地歌颂了江青。

同日 《红旗》第八期发表陈伯达、戚本禹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金敬迈、于会泳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京剧演员钱浩梁《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韩爱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万岁》；《智取威虎山》剧本。

同日 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中央文革文艺组成立，组长江青，组员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金敬迈、舒世俊、刘巨成、陆功达、李英儒、郑公盾。具体分工：李英儒：戏曲曲艺；陆功达：音乐舞蹈；舒世俊：电影；金敬迈：文学创作（文艺组实际负责人）；刘巨成：文博口；郑公盾：办公室。这个文艺组的成员后来大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有的被迫害致死。

同日 邮电部发行邮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共3枚。

同日 首都工代会、农代会、解放军、红代会及“革命文艺团体”所属8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起主办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共展出版画、漫画、宣传画、“语录画”等数百件。当天出版的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等主办的《美术战报》第4期报道了画展消息。

同日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在首都公演，连续演出37天218场。

同日 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演出歌颂“精神病人”陈里宁勇敢反对刘少奇的《新时代的狂人》。先后在天津、北京演出47场，观众5万余人。剧本印发北京、上海、青岛、新疆、吉林、湖北等地110个单位。

同日 《卫东》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刘邓陶联络站主办）特刊发表南大卫东红灯照创作组歌颂义和团的《红灯照》歌舞剧剧本。

同日 上海市革委会通知，电影故事片《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和美术片《半夜鸡叫》删去演职员表后在上海重映。同时放映供批判的“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不夜城》、《逆风千里》、《两家人》、《武训传》、《燎原》等。

5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

同日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大会，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等出席。会后演出了《收租院》、《长征组歌》。

5月25日 从本日起（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其中，《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删去了收信人杨绍萱、齐燕铭的名字和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语。

同日 下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巡回画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幕式。此后该画展到北京郊区工厂、农村、部队巡回展出。

5月27日 《红旗》第九期发表京剧演员杜近芳《光焰无际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

利万岁》。

同日 《北京工人》报道工人作家胡万春写成歌颂“一月革命”的短篇小说。

5月28日 新华社播发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同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纪要》此次公开发表时改动了20多处，未作说明。各大报次日刊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样板戏《红灯记》演出本。

5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样板戏《沙家浜》演出本。

5月30日 《新北大》第79期发表京剧演员谭元寿《江青同志率领我们战斗》。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称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在北京上演的八个现代戏为革命样板戏。

同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6月5日结束）。

5月 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

同日 《电影批判》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大中院校红代会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战斗组主办）第四、五号合刊出版，发表社论《学习革命样板戏，创造无产阶级新电影》、《向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打倒〈不夜城〉的后台刘少奇——天津第三毛纺厂（原东亚毛纺厂）部分老工人怒讨反动影片〈不夜城〉及其黑后台》、《斥蒂什科夫之流——驳苏修对〈林家铺子〉的吹捧》、《打倒刘少奇砸烂〈武训传〉》、《最最热烈欢呼中央文革文艺小组成立》、《从〈北京农业大跃进〉看旧北京市委的狼子野心》等。

同日 上海红旗（原海燕）电影制片厂红旗兵团与上海图书馆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开始编印《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到12月完成），其间，因搜集资料中看到了30年代有关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一些材料并有议论，被列为上海十大现行反革命案件之一，不少人遭到迫害。

6月1日 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中央文革文艺组、宣传组取代原中宣部。

同日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一书发行。

同日 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在北京演出《新时代的狂人》，剧中“一号英雄人物”原型陈里宁应邀观看演出并表示支持。

同日 《造反》报（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18期发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夺权兵团《彻底批判美术界全民文艺的黑样板——“万岁”》，批判哈琼文1959年创作的宣传画《毛主席万岁》（画面为花海中一年轻妇女肩上骑着小女孩在欢呼“毛主席万岁”，该妇女被斥为“不是劳动妇女形象”，而是“资产阶级少奶奶”，文革前即已迭遭批判，在某些城市还被禁止发行）。

6月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展，其中有大量美术作品（雕塑、版画、水粉画等）。

6月3日 《文艺战报》（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第15期发表批判

宣传画《万岁》（即哈琼文作《毛主席万岁》）是“全民文艺的黑标本”的文章。

6月6日 工代会、解放军及美术界造反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斩断刘少奇伸向美术界的黑手——彻底铲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大会”。

6月7日 《五洲震荡》报（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部分文体工作者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宣传组主办）5期报道话剧《夜海战歌》重新编排即将演出，发表《改编〈槐树庄〉经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再度上演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辉煌胜利》。

6月9日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乐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及三军负责人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正式亮相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原被视为左派的“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失势，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

6月10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数百个造反派组织14000多人联合召开斗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会。陈伯达出席并代表中央文革讲话。11、12日继续召开。

6月17日 毛泽东、林彪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江青等人陪同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

同日 中国革命博物馆造反派联委会召开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砸毁原展品中的瞿秋白像。

6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样板戏会演结束消息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6月22日 毛泽东、林彪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陪同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海港》。

6月24日 周恩来下午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批评了他们在会上的作法。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